

保险法中合理期待原则适用规则之构建

谢冰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合理期待解释原则作为保险法上的一项特殊解释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所运用,但亟需明确其适用规则。合理期待原则应平等适用于保险消费者,不应排除对老练被保险人的适用;应适用于包括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在内的格式条款,但不应用于个别议商性条款。对于“期待”之判断应考量保险人的行为是否引起被保险人之客观期待,包括保单以及保险交易中的误导行为。对于合理期待中“合理”之标准应考量被保险人之老练程度、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保单语言是否符合目的以及缴纳保费的多少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在适用位阶上,合理期待解释原则应当与一般解释原则同行,而非扮演最后出场的角色。

关键词:保险格式条款 合理期待原则 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

“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被认为是“由一些小小的判例串在一起形成的”^①特殊原则。该理论不仅被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所采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法》并未确立“合理期待原则”,但已有学者对该原则予以译介,学界对

其探讨颇多,^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被悄然运用。^③虽然国内学者大多对这一原则持肯定态度,却鲜有分析具体规则和可供适用的标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这一原则尚无系统、通用的标准。在美国,经过40多年的司法实践,合理期待原则已经发展出比较清晰的、可供借鉴参

作者简介:谢冰清(1985—),女,汉族,湖南娄底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文为2015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保险免责条款法律规制研究”(课题编号:15SFB2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英]M. A. 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

② 自我国学者樊启荣教授将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首次译介后,该原则已逐渐被多数学者接受,并见诸其后的许多著述中。参见樊启荣《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评析》,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国内学者对合理期待原则多持肯定态度,建议将其引入。参见孙宏涛《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探析》,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李利、许崇苗《论在国保险法上确立合理期待原则》,载《保险研究》2011年第4期;邢海宝《中国保险合同法立法建议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王林清《保险法中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适用及其局限性》,载《保险研究》2009年第5期。

③ 参见李利、许崇苗《论在国保险法上确立合理期待原则》,载《保险研究》2011年第4期。体现合理期待的典型案例,例如(2006)渝三中民终字第496号;(2009)宛龙民一初字第202号;(2009)南民二终字第901号;(2010)滉民一初字第838号;(2015)大商初字第00389号等。

考的适用规则。笔者尝试以其为借鉴,略陈管见,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合理期待解释:从原则走向规则

合理期待原则滥觞于“公平”理念,作为疑义利益原则(*contra proferentem*)的延伸与扩展,旨在为保险消费者提供更为周全的保护。^④自附合同说在保险法领域盛行以来,保险合同被视为“契约自由衰落”^⑤下最典型的附合同。保险合同之司法解释集中围绕其附合性展开。^⑥一方面,法官们意识到依靠传统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contra proferentem*)已难以因应保险交易的纷繁复杂;另一方面,由于奉合同法为圭臬,解释始终难逃“明示条款不得违反”之束缚,这也是合理期待解释理论起初未受重视的重要原因。^⑦进入20世纪以来,契约的社会化使得法官在解释合同时强调其与外部社会利益和公共政策的一致性。1970年,基顿(Keeton)教授在系统分析了1930年至1970年间美国法院众多判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合理期待原则。他认为,这些判例虽然判决理由不一,但实质上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理念,那就是以“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为导向。^⑧合理期待原则的提出挣脱了传统合同法上以文本解释为归依的桎梏,在美国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理论风暴,并最终得到了认同与倡导,成为保险合同法上一项新兴的解释原则。

然而合理期待原则在被美国法院接受之初一度被滥用,因而不断被诟病其实质是“法官的期待”而非“被保险人的期待”。^⑨对此美国保险公司纷纷采取“策略”应对,或提高保费,对额外的保障收取费用;或重新起草保险格式条款——以“包括条款”代替之前“除外条款”的方式。“包括条款”仅为保单中明确提到的特定情形提供保障,承保范围远远小于“除外条款”,且明显不利于被保险人。^⑩“这导致被保险人处于两难境地,面对更加严谨拟订、少有解释余地的合同,法院对过时条款进行广泛解释而有利于被保险人之利益,不过是付出大代价而获取的胜利,因此得不偿失。”^⑪

合理期待原则之所以遭到滥用,主要原因在于该原则过于笼统,类似于一个一般标准而没有一套独立的规则。“它的长处是法律的灵活性:能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结合起来。但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如果法官也在为某种意识形态效劳的话……,那么它也能为不公正的意识形态打开一扇方便之门。”^⑫因此,建立具体可适用的规则显得尤为必要。首先,这将促使司法调查聚焦于什么是“合理”的期待,为什么应该满足该“期待”。其次,原则的适用标准往往是宽泛而模糊的,极易引发司法上的不确定与

④ Eugene R. Anderson & James J. Fournier, *Why Courts Enforce Insurance Policyholders' Objectively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Insurance Coverage*, 5 Conn. Ins. Law Journal (1998), p. 342.

⑤ 此处所言“衰落”指契约自由遭到各种限制。参见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1页。李敏华《劳动契约自由规制及其实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5页。

⑥ See Friedrich Kessler, *Contract of Adhesion—Some Thoughts about Freedom of Contract*, 43 Columbia Law Review (1943); Allen Reames, *The Adhesion Contract of Insurance (Notes and Comments)*, 5 Santa Clara Lawyer (1964); W. David Slawson, *Mass Contract: Lawful Fraud in California*, 48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74).

⑦ 早在1896年,法官Stommon Darling在Sangster's Trustee v. General Accident Assurance Corp. Ltd一案中提出“保单应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但是保守的英国法院并没有采纳“满足合理期待”作为保险合同解释的原则。参见樊启荣《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评析》,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⑧ See Robert E. Keeton, *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 83 Harvard Law Review (1970).

⑨ See Kenneth S. Abraham, *Judge-made Law and Judge-made Insurance: Honor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 67 Virginia Law Review (1981).

⑩ Stephen J. Ware, *A Critique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56 U. Chi. Law Review (1989), p. 1472.

⑪ Jeffrey W. Stempel, *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p. 321~322.

⑫ [德]海耳穆特·库勒尔《德国民法典的过去与现在》,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不一致,而规则更为具体。根据一套确定的规则来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将为法院提供必要的指南,并有助于适用上的确定和统一。^⑬最后,更具体的规则将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行为指导。假如保险人能够从已有规则中确定是什么行为促使被保险人产生了合理期待,他们就可以作出改变,以避免引起错误的期待。

那么如何建立合理期待解释规则?作为原则的具体化与外在化,法律规则的构建离不开适用主体、适用范围与适用标准。下文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二、合理期待原则之适用主体

毫无疑问,合理期待原则适用于普通被保险人。但是,对于老练被保险人(the “Sophisticated” Policyholder)是否应当适用这一原则,国外学界与实务界持两种不同观点。肯定说认为即使主体为老练被保险人,仍应适用合理期待原则。^⑭否定说则认为合理期待原则不应适用于老练被保险人。其主要理由在于,合理期待原则旨在扭转保险交易中可能存在的不公,普通被保险人在保险交易中的确劣势明显,但老练被保险人却并非如此。老练被保险人具有相当丰富的保险经验,对于已固定化的保单条款也十分了解,在保险交易中与保险人地位已不相上下,若对他们也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是一种

无原则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司法偏见。^⑮

笔者则认为,否定说排除老练被保险人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理由不充分。

首先,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理论基础并非在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谈判或交易能力上的不平等,而在于保险格式条款具有“超级附合性”(super-adhesive)。^⑯第一,保险格式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合同主要根据保险人的意愿来起草。”^⑰这与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老练的经验以及丰富的保险知识无关。^⑱第二,保险人在起草保单时,并不会考虑消费者群体是否具有老练的经验,保单中也并没有对“老练保单持有人”的适用除外条款。既然保险人在制定并出售保单时并没有将消费者区分为老练或不老练的被保险人,何以在适用解释原则时作此区分并将老练被保险人排除在外?^⑲第三,即便老练被保险人拥有足够丰富的保险经验,或许能够选择对于自己更有利的保险产品,但他同样无法就内容与保险人进行协商或更改,因而对于保单的内容同样没有实质影响力,亦无法改变其在保险交易中的“附从”地位。因此,既然老练保险人与普通消费者一样,只能购买由保险人拟定且并无实际协商可能的保险格式合同,那么就不能因保单持有人的个人特质而

^⑬ See Kenneth S. Abraham, Judge-made Law and Judge-made Insurance: Honor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 67 Virginia Law Review (1981), pp. 1197-1198.

^⑭ Boeing Co. v. Aetna Casualty & Sur. Co., 784 P.2d at 514. 采用该观点的案例有: CNA of California Cas. v. Seaboard Sur. Co., 222 Cal. Rptr. 276 (Cal. Ct. App. 1986); New England Reinsurance Corp. v. Travelers Ins. Co., rev'd and remanded, 803 F.2d 1308 (3d Cir. 1986); Tonkovic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521 A.2d 920, 926 (Pa. 1987); AIU Ins. Co. v. Superior Court, 51 Cal. 3d 807, 815, 823-24 (1990); Reliance Ins. Co. v. VE Corp., No. CIV. A. 95-538, 2000 WL 217511, at 11 (E.D. Pa. Feb. 10, 2000)。

^⑮ Per Simon Brown LJ in Lancashire Council v. Municipal Mutual Ins. Ltd. [1996] 3 All ER 545 at 550-551. 采用该观点的案例有: Oritani Sav. & Loan Ass'n v. Fid. & Deposit Co. of Maryland, 989 F.2d 635, 642-43 (3d Cir. 1993); In re Reinforced Earth Co., 925 F. Supp. 913 (D.P.R. 1996); Commercial Union Ins. Co. v. Swiss Reins. Am. Corp., No. Civ. A. 00-12267-DPW, 2003 WL 1786863, p.9 (D. Mass. Mar. 31, 2003); Eljer Mfg., Inc. v. Liberty Mut. Ins. Co., 972 F.2d 805, 809-10 (7th Cir. 1992); Sphinx Int'l, Inc. v. Nat'l Union Fire Ins. Co. of Pittsburgh, 226 F. Supp. 2d 1326, 1336 (M.D. Fla. 2002) 等。

^⑯ Jeffrey W. Stempel, 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 Law 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holde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p. 465.

^⑰ Outboard Marine Corp. v. Liberty Mut. Ins. Co., 607 N.E.2d 1204, 1218 (Ill. 1992).

^⑱ CNA of California Cas. v. Seaboard Sur. Co., 222 Cal. Rptr. 276 (Cal. Ct. App. 1986).

^⑲ Brotherhood Mut. Ins. Co. v. Roseth, 532 N.E.2d 354 (Ill. App. Ct. 1988).

使某些解释规则得不到适用。^{②0}

其次,对老练被保险人不适用合理期待原则隐含着一种解释结果:即使付出的保费相同,购买的保险产品相同,但是老练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只能获得劣于一般被保险人的保险保障。^{②1}这种结果无疑是不公平的。对此,美国伊利诺州、华盛顿州及加州最高法院皆提出类似见解,认为争议内容为保险格式条款时,不能仅因企业的经济规模、专业水平、保险经纪人或法律顾问之代表而排除适用保护被保险人的解释原则。^{②2}

因此,笔者赞同肯定说,认为合理期待原则不应排除对老练被保险人的适用。

三、合理期待原则之适用范围

(一) 不适用于个别议商条款

时至今日,保险合同的江山几乎已被格式条款蚕食殆尽,但也不乏经双方当事人自由商议之“个别议商性条款”。^{②3}那么个别议商条款是否适用合理期待原则?

在 *Eagle Leasing Corp. v. Hartford Fire Ins. Co.* 一案中,^{②4}美国法院认为系争合同存疑。合同双方对保险合同之最终拟定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并且系争合同并非采用普通的标准印刷之形式,而是在标准印刷条款之外又特别为被保险人进行了特定修改,即保险人为了争取客户,特意为个别被保险人提供了“量身定作”的条款,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意志,故不能

适用合理期待解释原则。

笔者认为“满足被保险人的客观合理期待”的适用基础在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所处附从地位,但是对于个别议商性条款,由于双方之缔约能力几近平等,且经过双方自由磋商,难谓“附从”,实则与普通合同无异,故应探求双方之真意而非满足某一方当事人之期待。

(二) 适用于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的保险条款

鉴于保险业影响公共利益甚巨,各国都相应规定了对保险合同的干预,包括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格式条款的审批。^{②5}对于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的保险条款是否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学界同样不无争议。肯定说认为,尽管这种保险条款经过保险监管机构审批,但条款内容同样是保险人所拟定,因此应当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否定说则认为,保险监管机构在审批保单条款时,倘若发现保单存在显失公平、歧视、误导或不实陈述的内容,将否决此条款的效力,因此可视为其代表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就保单内容进行“谈判”。此外,预先印制的保险合同以行政审批为有效前提,若事后再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势必大大削弱行政监管的效力。^{②6}

笔者认为否定说有失偏颇,理由如下:

第一,对预先印制的保险合同进行行政审批,并不意味着排斥法院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②7}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相辅相成的,藉以检

^{②0} See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 and Regulatory Acts*, West Publishing Co., 1989, p. 658.

^{②1} See Jeffrey W. Stempel, *Reassessing the “Sophisticated” Policyholder Defense in Insurance Coverage Litigation*, 42 *Drake Law Review* 807 (1993), p. 823.

^{②2} Beh H. G., *Reassessing the Sophisticated Insured Expectation*, 39 *Tort Trial and Insurance Practice Law Journal* (2003), p. 85.

^{②3} 我国台湾学者刘宗荣将个别议商性条款归纳为两种类型:自始的个别议商性条款和由定型化条款转换而来的个别议商性条款,此两种类型均皆经过双方的协商。参见刘宗荣《论保险契约的解释》,载《月旦法学》2008年8月第159期,第115页。

^{②4} *Eagle Leasing Corp. v. Hartford Fire Ins. Co.*, 540 F.2d 1257 (1976).

^{②5} 我国《保险法》第136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应当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批、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前款规定制定。”

^{②6} *Allen v. Prudential Property and Casualty Insurance Co* (Utah 1992), 839 P.2d, p. 804.

^{②7} Jeffrey W. Stempel, *Unmet Expectations: Undue Restriction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pproach and the Misleading Mythology of Judicial Role*, 5 *Conn. Ins Law Journal* (1998), p. 221.

验与解释保险契约的规范性。²⁸ 行政监管机构对保单条款的审批属于事前规制,旨在防止保险人滥用“起草权”,侵害公共利益。而合理期待原则属于事后规制,对被保险人提供事后司法救济,禁止保险人滥用优势地位,保障保险交易之公平。从本质上来看,二者目的一致,功能相得益彰,不应进行割裂或有所偏废。

第二,国家保险监管部门相对法院来说对保险业务更为了解和熟悉,尤其是保险人使用的措辞和预设的费率,在事先得到监管机关认可的基础上的确能够大幅减少保险人滥用优势地位并侵犯被保险人利益的可能性,²⁹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彻底消除条款存在的不公平或被保险人利益被侵犯之可能。根据国外的“监管捕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的保险业者往往会影响甚至左右保险监管者的意志。³⁰ 从我国保险监管现状来看,监管效果同样不尽如人意,保险交易不公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既然行政监管机制并非完美工具,事后的司法救济机制就更加必不可少。

第三,对于不公平的条款,尽管保险监管机构有时会认定其无效或要求保险人予以修正,但实际上保险监管机构并不会主动对格式保单中的不合理条款进行大幅度修改,更遑论代表保险消费者与保险人进行“谈判”。概言之,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予以审批,仅为形式上的审查,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所处的“附从”地位。

因此,对于保险人起草的保险格式条款,不论是否经过保险监管机构的审批,合理期待原则都应当适用。

四、“合理”与“期待”之判断

(一)“期待”之产生

满足“被保险人的客观、合理期待”(objectively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olicyholders)如今已成为美国法院的共识。那么,如何认定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客观、合理的?这要求法官考察引发期待的原因,并以“门外汉”的立场来理解被保险人的期待。³¹ 美国法院往往从保险交易的情境出发,考察是什么因素引起了被保险人的期待。假如期待的诱因并非来自被保险人自身(例如主观理解上的差异),且该诱因的确将导致一个理性被保险人产生期待,那么这种期待会被视为“客观所致的期待”。“当公众购买保险时,他们有权获取期待的保障,他们不应遭受技术非难和隐藏的陷阱……应当在任何公平解释所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保障”。³²

1. 保单之误导。保单误导被保险人产生期待往往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保单条文晦涩深奥或含糊不清,极易造成误解;另一种是语义明确、清楚并无歧义,但是结构不清或编排上存在“陷阱”,以至于投保人未能充分了解保单规定的承保范围。对于第一种情形,在条款有歧义时可以适用疑义利益原则,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在保单用语过于专业晦涩但并无歧义时,疑义利益原则无从适用,此时合理期待原则就成为有利的补充工具。对于第二种情形,假如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则应当认定被保险人对承保范围的期待是客观、合理的。³³

2. 营销模式之误导。营销模式也是影响被保险人产生合理期待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学者认为,保险公司的营销模式完全可以塑造保单持有者的合理预期。³⁴ 随着保险的复杂化,这种

²⁸ 罗俊伟《论保险契约之规制》,载《万国法律》2012年6月第171期,第17页。

²⁹ 参见[美]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册),荆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91页。

³⁰ 同上注,第169页。

³¹ See James M. Fischer, Why Are Insurance Contracts Subject to Speci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Text versus Context, 24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992), p. 1005.

³² Kievit v. Loyal Protecti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170 A. 2d 22 (N. J. 1961.).

³³ Mark C. Rahdert,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Reconsidered, 18 Connecticut Law Review (1986), p. 335.

³⁴ Stephen J. Ware, A Critique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56 University Chicago Law Review (1989), pp. 1472~1475.

影响也越发明显。例如,自动售货机式营销、电子营销保单等,投保人往往在未经充分考虑或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订立合同。^⑤由于投保人所接触到的保险条款相对简单,又缺乏保险人及其代理人的面授机宜,投保人对于保单的保险范围通常很难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假如保单条款以言外之意表达了不公平之处,那么法院会倾向于采用合理期待原则。

3. 保险代理人之误导。在现代保险模式中,保险代理人已经成为连接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重要纽带。据学者调查统计,在对保单承保有任何疑问时,77%的被保险人会求助于保险代理人,另有8%求助于保险公司,只有11%求助于保单本身。^⑥然而,由于保险代理人的主要动机是销售保险,为了提高业绩可能会选择性地向投保人提供有利于销售的信息,或是对保险范围做出笼统的解释。^⑦此外,保险代理人还常常以一些不当行为来获得业务并取得佣金,例如对投保人错误引导、不当说明、夸大产品功能等等以说服保险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不当代理行为引起的直接后果往往是保险消费者错误地理解保单的实际承保范围,继而产生了过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应该被视为合理并得到满足。

4. 保险产品名称之误导。有时保险产品的名称也是误导被保险人的一大因素。典型的做法是在标题之中选择使用诸如“一切险”“综合险”“全险”等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词汇,但是在保单中却又对其做了诸多难以察觉的限制,由此引发投保人的合理期待。这种表意不准确有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故意设计诱导

性用词,导致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的期待与保单内容不一致,对此法院一般会对投保人的期待予以承认。

5. 保险广告之诱导。在现实生活之中,保险广告对于消费者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保险人承认的承保范围往往与其宣传的范围存在着一定差距。例如使用“保你万无一失”等广告用语对投保人予以消费诱导,导致投保人依据广告而产生较高的期待,对此法院应当考量并予以保护,即便保险合同本身已经进行了更多的限定也不能排除投保人的期待。^⑧

综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保险业自己造成了合理期待问题。”^⑨满足这种期待,与其说是因为这种期待客观、合理,毋宁说是对保险人的不当行为予以的规制和惩罚。诚如 Kenneth 教授所言,合理期待原则反映了一个优雅、简单的理念,即人们应该能买到他们合理想要的保险。随之可以推知,人们不应该被引导去相信他们会有他们合理想要的保障,但事实上他们却并没有这种保障。^⑩法院必须确定合同弱势一方依据相对方所宣称提供的服务能合理地期待获取什么,以及服务提供方在多大程度上使前述期待难以实现。^⑪

(二) “合理”之标准

除了判断期待的诱因是否来自客观因素之外,合理期待原则在适用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认定被保险人的期待属于“合理”,也就是说法官通过什么因素或什么标准来判断期待具有“合理性”。对于哪些因素构成期待之“合理”,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这使得认定“合理”衍生

^⑤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中译本),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页。

^⑥ J. David Cummins,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Auto and Homeowners Insurance, Journal of Risk & Insurance 43(1), 1976, pp. 3-9.

^⑦ See Jeffrey E. Thom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5 Conn Ins Law Journal (1998), p. 318.

^⑧ Suarez v. Life Ins. Co. of N. Am., 254 Cal. Rptr. 377, 382 (Ct. App. 1988).

^⑨ John Dwight Ingram, The Insured's Expectations Should be Honored only if They are Reasonable, 23 Wm Mitchell Law Review (1997), p. 817.

^⑩ Kenneth S. Abraham, The Expectations Principle as A Regulative Ideal, 5 Conn. Ins. Law Journal (1998), p. 63.

^⑪ Friedrich Kessler, Contract of Adhesion—Some Thoughts about Freedom of Contract, 43 Columbia Law Review (1943), pp. 629-630.

出诸多不确定。^④ 尽管英美法上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规则对“期待”之合理性予以规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案来判断,但是通过梳理案件中判定“合理”与否的几个因素,的确能够帮助法院更好地理解 and 适用合理期待解释原则。^⑤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确认“合理期待”标准的几个主要因素有:

1. 被保险人的老练程度。对老练被保险人不应排除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但被保险人的老练程度往往对法院判定“合理期待”产生影响。^⑥ 美国通过审判实践发展出几个判定被保险人老练程度的因素:(1) 被保险人的经济实力。一般而言,越是经济规模大的被保险人,就越有经济能力来保障合同文本接近其“合理期待”。^⑦ (2) 律师或保险经纪人的参与。如果保险合同在签订之时,有律师或保险经纪人的参与,那么法官会考虑从专业角度而非外行人的立场来考察期待的合理性。(3) 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一般来说,对于保险条款越熟悉的被保险人,例如其本身从事保险行业,法院对于其期待的合理标准会越高。在 *Services Holding Co. v Transamerica Occidental Life Ins. Co* 一案中,^⑧ 被保险人为保险业务员,法院并不以此而排斥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但被保险人的经验及专业知识成为判断其合理期待时考量的因素。

2. 被保险人能否获知保单保障的实际情况。合理期待原则颠覆了传统合同法上合同相对方之“阅读义务”,并假设一般的保险消费者

未能阅读和读懂保单是合理的,除非保险人能够证明该被保险人没能阅读保单文本的不合理。^⑨ 尤其对于除外条款、免责条款,假如被保险人并未知悉或难以察觉,那么就可能对实际承保范围产生过高的期待。保险人或代理人应当对此承担明确告知义务,避免过高的期待。^⑩ 假如保险人已经就保障范围对被保险人作出了明确说明,那么被保险人在此范围之外产生的期待就不应被视为“合理”而得到满足。^⑪

3. 保单条款语言是否符合保险目的。假如保单语言本身并无歧义或晦涩之处,但不合理地限制了承保范围,使得保险的基本目的难以实现,那么被保险人基于保险目的所产生的期待就是合理的。在 *C & J Fertilizer, Inc. v. Allied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一案中,^⑫ 初审法院根据保单载明的语言——盗窃行为必须具有“可见痕迹”,判决保险人无需赔付。但是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其认为,首先,保险人没有就“可见痕迹”这一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进行说明。其次,“由于原告与被告的代理人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这使得原告产生了合理的期待,期待不管第三方偷盗留下了什么样的证据,被告都不应通过‘偷盗’的定义否认保险保障,即使在经营场所外部没有留下痕迹。”最后,法院还指出,案件中的除外责任条款使“偷盗”的定义模糊化了,既而使保险人的赔付义务取决于盗贼的技术而不取决于“被盗事实”,这无疑与保险目的不符。因此,上诉法

^④ See Kenneth S. Abraham, Judge - Made Law and Judge - Made Insurance: Honor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 67 Virginia Law Review (1981), p. 1188 ~ 1189.

^⑤ Robert H. Jerry,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Matthew Bender & Co., Inc., 1996, p. 110.

^⑥ *Borman's, Inc. v. Michigan Property & Casualty Guar. Ass'n*, 925 F.2d 160, 163 (6th Cir. 1991) (holding a statutory limitation of ability to collect claims against state guaranty funds based on net worth of insured does not violate constitution), cert. denied, 112 S. Ct. 85 (1991).

^⑦ Alan Schwartz & Robert E. Scott,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 Law, 113 Yale Law Journal (2003), p. 545.

^⑧ *Services Holding Co. v Transamerica Occidental Life Ins. Co.*, 883 P.2d 435 (1994).

^⑨ Robert E. Keeton, 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 (pts. 1 & 2), 83 Harvard Law Review (1970), p. 968.

^⑩ Robert H. Jerry,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Matthew Bender & Co., Inc., 1996, p. 111.

^⑪ See Dudi Schwartz, Interpretation and Disclosure in Insurance Contracts, 21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2008).

^⑫ *C & J Fertilizer, Inc. v. Allied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Iowa, 1975).

院作出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判决。概言之,保单语言是否符合保险目的,亦是考察期待是否合理的因素。

4. 所缴纳保费的数额。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与其所获得的保险范围存在着正效应,因此缴纳保费的多少也应当被视为判定被保险人期待合理与否的一个重要客观指标。一般来说,如果被保险人所缴纳的保费畸高,明显与同种或同类保单保障的范围不一致,那么被保险人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保险合同保障的范围较宽。据此,若保险人收取了较高保费,却又在保单中不合理地缩小承保范围,那么法院将认定保险人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并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既然保险范围与投保人所投保费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也理应与其所缴纳的保费保持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保费越高,合理期待就越高。^⑤

上述标准尽管对于法院的判案具有一定帮助,但是对合理期待的判定仍然非常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个案判决不尽一致,带有法官的个人色彩在所难免。故也有学者指出,法官在个案之中解决上述标准的模糊性也正是审判活动的本质。^⑥

五、合理期待解释的中国路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尽管一些法院适用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通常理解”以及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等来解释保单,但实际上却已超越了这些规则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并体现出法院在审判中“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来作

解释的偏好。^⑦只不过由于立法尚无这一原则,故法官们将这一理念泊于其他法律规范的“码头”。在法定解释规则捉襟见肘之时,法院尝试以“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来实现公平、合理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往往依靠扩大适用解释规则抑或补充适用其他法律规范来实现,但却共同表达着一场突破传统合同法理念的“悄悄的革命”。

在我国当前保险消费者权益堪忧、保险业“诚信度”遭受质疑的背景下,合理期待原则作为对现行法律规范的补充,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⑧在适用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如上文所述,确定司法之适用规则。那么,如何协调合理期待解释与其他解释规则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合理期待原则只是一种有限的解释工具,它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一样只能扮演最后出场的角色。然而倘若依照这种观点,在保单无歧义时,自然无法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假如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能够得出公平的解释结果,合理期待原则也无适用之必要。我们知道,合理期待原则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弥补传统解释规则乏力之缺陷,“若严格谓其劣于其他法定解释方法适用,无异压缩其适用空间至零”,^⑨故合理期待原则应当与一般解释原则并行适用。^⑩对保险格式条款之内容以“通常理解”作解释,但保险消费者在保险交易所产生的合理期望不应当被“清晰的文字”所剥夺。当合同内容存在疑义时,合理期待原则亦可以作为疑义利

^① See Jeffrey W. Stempel, *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pp. 336 ~ 337.

^② Jeffrey W. Stempel, *Unmet Expectations: Undue Restriction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pproach and the Misleading Mythology of Judicial Role*, 5 Conn. Ins Law Journal (1998), p. 106.

^③ 参见(2009)宛龙民一初字第202号;(2009)南民二终字第901号;(2010)滏民一初字第838号;(2014)虹民五(商)初字第791号;(2014)庆中民终字第35号;(2015)大商初字第00389号;(2015)杭上民初字第1692号;(2015)宜民二终字第00214号;(2011)榆中法民二终字第165号;(2011)济中民三终字第106号;(2011)榆中法民三终字第00141号;(2011)浙金商终字第1021号;(2011)榆中法民三终字第00146号;(2011)榆中法民三终字第137号;(2011)榆中法民三终字第93号;(2011)榆中法民三终字第28号;(2011)洛民终字第1443号;(2011)津法民初字第232号;(2010)常民三终字第232号;(2011)泗商初字第0160号;(2010)南民一终字第727号。

^④ 参见樊启荣《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评析》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张冠群《保险契约条款“疑义”之认定与解释——评台湾高等法院100年度保险上易字第一号判决》,载《月旦法学》2012年11月第210期,第209页。

^⑥ Dudi Schwartz, *Interpretation and Disclosure in Insurance Contracts*. 21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2008), p. 125.

益解释之辅助,是以作出较为合理与公平的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海商法、保险法研究所所长黎建飞点评:

保险法上的合理期待原则自被美国学者明确提出以来,在美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90年代的盛行期,20世纪90年代的衰落期与21世纪至今的复苏期。总的来说,其不仅被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所采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保险法学界对该原则亦探讨颇多,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将该原则引入我国保险法中。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对该原则已有所运用,但是在学理上,我国学者大多探讨引入该原则之价值与意义,对于该原则究竟应

当如何具体适用尚缺乏深入研究。由于在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该原则在适用上存在不确定性。本文从学界着墨较少的合理期待原则之适用入手,旨在为司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适用规则,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文章以借鉴美国对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为中心,从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标准等方面展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可供司法参酌的建议。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谨、论述清晰。对于该原则在美国司法适用中尚存争议的几个问题,作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进行了辩驳与论述。从文章注释不难看出,作者参考了大量外文文献,并对美国法院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相关案例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此外,文章语言简洁,文笔精练,使得文章整体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in Insurance Contracts Interpretation

Xie Bingqing

Abstract: The 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RE), as a special interpretative principle of insurance law, has been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but different courts have taken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o the doctrine, so it needs to make clear the applicable rules. DRE should be used to all insurance consumers including the “Sophisticated” insured. It should be applied to insurance standard terms including those approved by the insurance regulatory, but not to the terms negotiated. DRE focus on two aspect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insured and whether the expectation is reasonable or not. In identifying the “expec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confirm whether the insurer’s behaviors caused the objective expectation of insured, which including giving some illusive information about coverage in policy and misleading consumers to make insurance purchasing decisions. As for “reasonable” standard, the expect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by a rational evalu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so cour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the insured is sophisticated, whether the insurer has disclosure terms clearly, whether the language is plain and conforms with the purpose of policy, and the amount of premium and so on. Besides, DRE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rather than after, other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Keywords: insurance standard terms;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honor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

(责任编辑:李辉)